

中國現代哲學史

資料匯編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 第一册）

哲 学 论 战

（上）

主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二年一月 沈 阳

第 二 集 说 明

本集收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哲学战线斗争的资料。共分八册付印。

第一册：哲学论战（上）

第二册：哲学论战（中）

第三册：哲学论战（下）

第四册：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上）

第五册：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下）

第六册：中国文化问题论战

第七册：唯生论批判

第八册：村治派批判

目 录

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	艾思奇 (1)
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	艾思奇 (8)
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	艾思奇 (10)
论思想文化问题	艾思奇 (13)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艾思奇 (19)
谈理性主义	胡 绳 (20)
理性主义	胡 绳 (22)
启蒙运动	胡 绳 (24)
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	何干之 (25)
哲学的国防动员	陈伯达 (27)
论新启蒙运动	陈伯达 (30)
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	
再论新启蒙运动	陈伯达 (33)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伯达 (38)
中国社会科学运动的意义	梁 平 (50)
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	谷 荫 (58)
思想的论坛上几个时髦问题	张东荪 (66)
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	孙道升 (73)
现阶段中国思想主潮变迁的历程	郭胜任 (77)
西方学术思想在吾国之演变及其出路	张君勱 (98)
最近的中国哲学界	谭辅之 (101)
现代社会学 (第一、四版序)	李 达 (108)
马克思主义之批评	赵兰坪 (109)
哲学并不神秘	艾思奇 (123)
哲学也有不空洞的	艾思奇 (126)
哲学的真面目	艾思奇 (129)
《哲学讲话》批评的反批评	艾思奇 (131)
关于哲学讲话《大众哲学序》	艾思奇 (134)
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艾思奇 (138)
哲学的内容廓轮画	胡 绳 (140)
哲学底任务是什么?	彭 康 (143)
叶青之所谓思惟科学	艾 生 (147)

哲学到何处去并答叶青君	艾 生 (151)
现代的哲学的新姿态	陈伯达 (161)
哲学上的两条路线及其历史的演变	陈伯达 (164)
关于名学的性质	张东荪 (168)
哲学究竟是什么	张东荪 (171)
一个哲学的会话	
——答魏嗣銮博士——	(如松)叶 青 (178)
关于《怎样研究哲学》	叶 青 (195)
关于哲学存废问题	叶 青 (190)
关于《哲学到何处去?》	叶 青 (198)
哲学问题(节录)	叶 青 (207)
新哲学的两条战线	叶 青 (211)
从哲学说到科学	
——答丁逢白和艾生——	叶 青 (219)
费尔巴哈论纲第一句	
——答王宜昌——	叶 青 (223)
关于我底几个理论意见	叶 青 (228)
关于哲学消灭论	叶 青 (237)
哲学消灭论底检讨	杨伯恺 (245)
谈联合哲学与统一哲学	心 远(卢心远) (259)
读《哲学讲话》以后	王一知 (261)
读《新哲学论集》以后	王一知 (264)
艾思奇的《新哲学讲话》	谭辅之 (270)
艾思奇哲学与叶青哲学之比较观	谭辅之 (273)
思想上的矛盾怎能消灭	谭辅之 (277)
哲学的意义和特征	贻 非 (281)
从中国哲学年会想到中国哲学家的任务	晓 波 (282)
几个哲学问题	艾思奇 (285)
哲学问题四则	艾思奇 (289)
什么是机械论的唯物论	思 奇 (291)
略说新唯物论	思 奇 (292)
观念论的要点	思 奇 (294)
真理的问题	艾思奇 (296)
认识论上的问题	艾思奇 (297)
《新哲学大纲》译者序	艾思奇 (301)
辩证法唯物论梗概	艾思奇 (302)
中庸观念的分析	艾思奇 (305)
科学上的物质观与哲学上的物质观	胡 绳 (309)
宇宙和社会本体	胡 绳 (311)

关于真理的诸问题·····	胡 绳 (314)
物质为什么会运动发展·····	胡 绳 (319)
物质怎样地变动发展·····	绳 胡 (321)
真理的追求·····	胡 绳 (324)
叶青哲学往何处去? ·····	沈志远 (326)
腐败哲学的没落	
——为批判张东荪编的《唯物辩证法论战》而作 ·····	陈伯达 (335)
叶青的《辩证物质论》·····	何 封 (347)
强奸了经验论	
——评杨伯恺先生 ·····	艾 生 (349)
叶青哲学的本质·····	黄 琪 (353)

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

艾思奇

一、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

现在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繁重的问题，详细的展开恐怕要几十万言，本文只能作简略的概说。

哲学文化现象的一部门，文化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建筑起来的社会底文化。研究中国哲学，必须明了中国文化。欲明了中国文化，又必须了解中国的社会构造及经济关系，本文论述廿二年来的中国哲学思潮，拟随处照应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概况。这是正当的公式，也是必要的真理。

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自然又是一个繁重的问题。“社会史的论战”已出到四大辑，言论超过了百万字，问结果呢？恐怕谁也觉得，正等于十年前的“科学人生观之论战”一样，将问题扯得一塌糊涂，公认的结论却没有在那儿诞生。这用不着奇怪，“论战”的编者已告诉过我们，参战者的各人都是有党派的，带着自己特有的使命来上战场，目的自然是征服他人，为着一统天下的必要，有时自然不免歪曲了事实。这样一来，不要说四辑，便是四十辑也怕战不完。真理自身仍是在地下兀自前进，真正能拥护真理的“党派”，其胜利也决不是要求诸于这仅仅四五辑的书本里的。

因此，要怎样来看我们这一个怪物的中国，就成为繁重的问题了。现在自然不能繁征博引地作专门的论证，只就立论需要的地方作一个素描。

“社会史底论战”中的诸将们大部分都是标榜“应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的。但当有的人提出如下的问题时，问题的提出方法就是非辩证法的了。即：中国是封建社会呢，抑是资本主义社会？至于为着“派”的主张，勉强拉一些似是而非的统计材料，便断定中国是十足的资本主义社会或纯粹封建社会，则更是反辩证法了。因为参战者在这里有了这样的一种企图：想在这非常迅速地运动，变化，解体中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看见一个固定不变的古典底社会形式。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社会因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强压而起了内部的极其庞杂的变化，这里也有资本主义，然而只是雏形，也有封建社会，然而在不断地崩溃没落，这两种不健全的存续物，又都是作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而苟延其残喘的，在这里，要冠以封建底或资本主义底任何一个形容词，同样都不可能。不如直截了当地就称作半殖民地社会，还可以将其特有的意义包括完全。

半殖民地虽然不是一种特别的社会形式，却有特别的发展状态，这特别的发展状态是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的。这社会经济之特别的发展状态中，文化的发展形式也有着特征。

第一，半殖民地里有资本主义的雏形。“资本主义以自己为模型而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在侵略殖民地的过程中，也将自己文化向殖民地输入，因此我们在中国也看见帆船被轮船打倒，铁路延长，机械工业的增加。论战者如任曙先生，曾据此主张中国已是十足的资本主义

国家，然而这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要素的存在，我们固然不能否认，但这一切要素的主要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帝国主义者的附庸或其侵略工具，中国民族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不起国际金融资本的巨大的重压，只继续着奄奄一息而已。不怕机械轮船的侵入多么利害，中国“自己”决不能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至多也只能说：中国已具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定的雏形，而非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在文化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中国有资本主义底观念形态，而这观念常是在不成熟的状态之下告终。二十二年欧美资本主义的文化不断地介绍进来，但都只是达到介绍的程度便止，莫说发扬光大，连比较精深的咀嚼研究也是很缺少的。胡秋原先生曾说过：“一个很容易接受外来思想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是这种思想扩大深入的阻碍物”。中国诚然是太容易接受外来思想而不容易使其扩大深入了，连说话的胡先生自己，也因为差不多完全无条地接受了普列哈诺夫主义，结果在思想上陷入了普列哈诺夫以上的混乱和矛盾（这事很多人曾论到过，作者在别的地方也有论述，不能在本文内备述）。这事，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是学者之过，做官的心比做学问的心更切。根本的原因，仍由于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不能抚育更深入的学理的缘故。

第二，不稳固的封建社会形式的存续。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因帝国主义的不断的侵略而不能遂行稳固的支配。满清政府的倒坏，是封建社会基础动摇的第一次表现。连年的军阀内战，是封建组织解体的成果。这一方面封建社会在不断地解体，而那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因前述理由而不能起来代替其位置，于是封建社会只能老是以苟延残喘的形式存续下去。旧的已腐败衰老，新的又无力成长，社会的破局因此只能日益深刻而扩大起来。世界史上与此类似者，可以古代罗马为例。罗马社会之没落而为黑暗时代，即由于类似的原因——这是马克思也曾指出过的。封建势力之残存，在文化上则成为传统观念不断的复归。满清政府倒坏以前，便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说之翻译介绍，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则直到五四还没有打破，从五四起，科学精神开始被提高了，然而科学方法到后来的最大用处只是在“整理国故”，接着东方精神文明的呼声还一天比一天地高叫起来，孔祀已废除，而各地的祀孔者仍比比皆是。近来甚至又有人主张读四书五经，为全国青年推撰“庄子与文选咏歌”宫殿的文章者还算是海上的新文学家。资本主义的幼弱的雏形及封建意识之不断的复归 在中国是并行的。

第三，文化发展的短促和繁杂。因社会组织的幼弱而不健全，任何方面的文化发展都有着短促而不坚定的特性。再没有比中国这样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国家，也再没有妨碍思想的牢固深入如中国的了。文化在中国，真正“万花撩乱”无所不包容的状态。二十二年来来的短期中，可以看见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缩影。以前就有人称过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然而不但文艺复兴，就是工业革命之类的变化，也以极简略的形式表现过了。如果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历史是生物进化史，则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化不妨说就是胚胎发生史。胚胎的发生因种种影响固不尽能处处模仿种族发生史，同样，中国文化也不尽是完整的欧洲史，但中心脉络之存在，却是历历可见的。故外表似“万花撩乱”的中国文化现象，其发展的径路决不是不能清理，只不过较繁较多，而又少有牢固深入者，不易把握罢了。欲寻求哲学在二十二年来发展的主流，也是可能的。

二、哲学思潮之横的解剖

哲学上的各种主要特征也就是文化一般的特征。有文化的资本主义要素便有资本主义型的哲学，有封建底文化要素便也有哲学的保存的源流。整个的文化现象是多么庞杂，则哲学的部门中也有相当的驳乱之表现。对于二十二年来来的中国哲学思潮，可以分割如下：——

第一，种种输入底资本主义型之哲学。在满清政府崩溃以前，即有种种的自由思想之输入，严复的翻译，“斯民丛报”等类出版物之介绍，虽然谈不上哲学，至少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型新思想之最初的具体表现。辛亥革命的发动者，不论从物力财力方面说，举南海人及海外华侨为中心，他们的思想之能称为最前进者，也因为他们的生活受近代资本主义的熏染较早的缘故。但资本主义型的思想之突飞猛进的成长及新哲学思潮的正式成立，是在民三以后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事。这时谁都知道是因为列强忙于欧战，无暇顾及远东的侵略，于是中国从受资本主义熏染的地位进而养成了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得以眉目具备者全是为此，五四文化运动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的得意时代。在哲学上，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其他的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这是小小的亚美利加式的哲学思想。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思想的寿命是不长久的，浅薄的美国式的哲学不久便遭遇到反动。当欧战告终，列强又张牙舞爪地向东方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忽被压倒的时候，厌世的反动的观念形态便开始遮蔽了整个文化界，马上便来了一个“科学的人生观之论战”，论战的结集虽然是以吴稚晖先生说的是根据科学而考案出来的“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压了卷末，似乎科学终于胜利了。然其实科学的人生观仍是“漆黑一团”，压不了玄学者的勃然而起的锐势，于是哲学界普遍地研究起人生问题来，印度哲学，道家哲学，儒家哲学等等的研究盛极一时，太戈尔被敦请到东方，唐大圆及太虚法师之流也大出风头。但人生问题的研究中有资本主义型的哲学，世纪末的欧洲哲学界，自叔本华尼采倭根以至柏格森狄尔泰，无一人不是以人生的研究为哲学问题之中心者。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生哲学当时也输入了中国，与中国当时的需要相吻合。因为世纪末的哲学是欧美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路道上时的挣扎中的梦呓，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当时也正是开始没落了，原因虽不同，而结果则类似，故柏格森尼采等的研究便盛行起来，我们现在就可以指出李石岑先生，便是受尼采之影响最深者，又如朱谦之先生的唯情哲学之柏格森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虽然朱先生曾说柏格森的直觉哲学重记忆，唯情哲学重理想，前者累于过去，时者能烛照将来，似乎有一步的前进，但根本的方法，则宁可以说先生是柏格森的遮拾者。人生问题的研究既盛，以“漆黑一团”结束的“科玄论战便被人置诸脑后，占在人生问题的立场”，朱谦之先生曾批评过“漆黑一团”的宇宙观，说人生既漆黑一团而没有意义，则人们便容易发生悲观念头，故这样的人生观是不妥当的——这正是宣布了所谓“科学底人生观”之失败，而提高了玄学问题的显明的徽文。

中国社会此后的发展情势是日甚一日的破产，民众的百分之九十九都不可避免的向下没落，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恐慌的一天天地增大起来，中国民众的命运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命运在同一前途上看见了同一的曙光，历史的法则已现露于世界之前，中国人也看见科学底社会主义了。于是辩证法的唯物论的哲学思潮便狂风暴雨似的披靡了整个哲学界，社会主义的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历史事实，故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潮在某种意义可以归入资本主义型的一部。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之盛行，是全世界及中国革命势力发展之结果，它自身直到现在遭受了种种的变难经过，等下节才能细述。

第二，封建底哲学传统之不断的复归。辛亥革命主要原动力决不单是华侨的资助，更不能称之为资产阶级底革命。表面上固然造成了共和底民主政体，实际并未曾真的有了资本主义底社会组织，只能把它看做从来稳定的中央集权式封建社会之解体的一过程而已。辛亥革命的结果不是真正的民主化，而是军阀割据的局面之开始，是从整个的封建社会一变而为分

崩离析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仍是一样地存在，故革命后的第一任大总统不是海外华侨活动的中心孙中山先生而是国内封建势力的中心袁世凯。若要问：这时中国哲学之主流何在？就可以答复：革命后至少三四年间，思想文化仍被传统所君临。欧美的哲学思想虽然早有输入，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前提之下，儒家思想终究仍是稳固的一尊。传统的地位被看得很高，思想论证常喜到四书五经中去寻找根据。新的思想方法之出现，是在五四的炮声发出以后，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因此就成为五四文化中的天之骄子。在这种意味上，与其说胡适对于新文化有何种新的创见，不如说他的功绩仅仅在于新底思想方法之提出。否则，就实验主义的应用的方面来说，在胡适不过用以“整理国故”，成就了中途夭折的“哲学史大纲”，政治上又只落得一个一塌糊涂的好人政府的空想，要问积极的业绩，是丝毫说不上。

而在胡适的本身，因“科学方法”之被用来“整理国故”，已开始了封建哲学复归的端绪。标榜新的科学精神之实验主义竟不能一直向前去开辟新的科学的天地，却拆头攒向旧字纸篓里来！胡适自己又渐渐地从学问的路走上了升官发财的路！前节已说过，自从人生问题的研究盛行起来，儒佛道诸家的学说竟成为哲辩研究者的主要对象了。直到一九二七年，辩证法的唯物论之洪流席卷了全国，学者的眼光开始才知道由人生问题转向社会问题。研究有素如李石岑先生亦不惜放弃了旧来的思想，而唯情哲学者朱谦之先生也开始在暨大讲授黑格尔哲学及唯物辩证法了。但顽固不化的封建传统仍继续存在，仍不因此而至于消灭，不必说张东荪先生到最近还在诅咒他所谓的“俄国哲学”，目前我们就见到所谓的“唯生论”哲学幽灵似的出现，唯生论与欧洲及日本的“生命哲学”或“存在论哲学”有大同小异，但中国的主张者是以佛经或四书五经为立论基础的，这毕竟仍是封建意识之复归，等下节又再细述。

三、哲学思潮之纵的展望

二十二年来中国哲学是以上述的要素构成，现在再要说一说这些要素所构成的哲学究竟是以怎样的态势发展过来？对于这半殖民地中国的哲学之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先总括几句：“资本主义以自己为模型去改造世界”，中国国内有了资本主义的要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赐！但帝国主义还不只是将资本主义要素带入中国，也使中国的历史取着过去资本主义史的雏形而发展起来，前面已说过，五四文化运动颇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类似的地方还不只五四文化运动，在其他的每一时期，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事实，以下打算将二十二年来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史随时作一个对比的说明，这很可以帮助了解。把五四以前辛亥以后的中国哲学时期看做欧洲中古的经院哲学时代，虽不能说处处恰当，但根本的情势则是一致的。欧洲经院哲学固然足不能出寺院门外，言不敢有违新旧约，而研究之盛，足以成为新时代来临的前兆。新时代若不会来临，则僧侣们尽可以高枕无忧地悠闲度日，何必穷费研究的心思？故经院哲学的发生，实在是教会的一种必要。教会曾支配黑暗时代的欧洲将近千年，突然看见另一个时代要诞生了，为着企图稳固旧的传统以抑压新势力的生长，教会的封建观念形态的营垒上更布置起哲学的防线，经院哲学处处企图用圣经解决一切，这事实适足以反映圣经的反对者已兴起，信徒们于是不得不更紧张地把握起自己的武器，不能不更认真地检视自己的阵容。然而异状甚至竟在圣经的自己阵营内发生起来，经院哲学内就有了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而唯名论正是反教会的个人主义哲学之新天使，这唯名论的主张之最有力者，正是资本主义最先进国英吉利的屋干 Wilhelm Ocam，

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基督教会，但有至圣先师的孔子，没有新旧约，但有四书五经，没有经院哲学，但有“中学为体”的根本成见。然而，虽说“中学”为一切根本，但“西学”已取得了“为用”的地位，足以与“中学”相抗拮，其作祟的力量并不下于经院哲学中之唯名论。还有辛亥，中国人便已多少领教了“西学”的力量，一直到五四时期，西欧的文化价值一天比一天显露出来，尤以近海交通便利者受影响更深，然不到五四这一突变时期的来临，不到五四文化运动突起以彻底的方法论向传统作最后猛攻时，资本主义文化及哲学对于中国终只是一种输入品，不能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立根生长，正如唯名论虽然已有了个人主义的內蕴，而自身终只能被囚于经院哲学的牢笼之内一样。

真正的新时代之到来，是在新时代已完成了自己特殊的武器而能独立地与传统作战的时候。在欧洲，这就是文艺复兴以至启蒙运动的时期，在中国，就要举出五四。五四在哲学上的表现与欧洲的相同点是：两者同是以新的科学方法之建立为基础。第一次从经院哲学脱然而离的欧洲新哲学，便是培根的归纳法，其次是笛卡儿霍布士从数学借用来的演译法，斯宾诺莎之于几何学来布尼兹之于微积分，同样都有新的科学方法之建立。总之，科学的应用是新兴资本主义者的得意事，科学使他们认识一切，征服一切，因此，在哲学上，他们也同样地揭起了科学上借来的方法，与经院哲学之以圣经攢研为唯一能事者相对抗。结果自然是科学的胜利。在五四文化运动中，科学方法之被人重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实验主义虽然与笛卡儿，培根等学说不同，要不外仍是一种从科学借来的方法论。哲学上的思想方法之科学化，就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比其他任何的研究介绍都更极重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价值，可以说远不及他的“拿证据来”的实验主义精神之价值。实验主义在今日，谁也知道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它能一变而成唯心论哲学。而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胡适在当时之能成为得意人物，不是因为有什么系统的大贡献，也不是如某人所说，能给中国人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是为了实验主义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罢了。

欧洲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在中国仅短缩而为五六年的五四文化运动，各种各样的新思潮辐辏而来，时期太短，不容有任何精深的创造底贡献，系统的大著都是以翻译为主，若要细述派别，实在不仅止实验主义一种，但实验主义因为最与时代需要切合而成了主流。以后很快地便是欧战告终，国际帝国主义的屠刀又向东方坎来，民族资本主义因以没落，新的哲学还来不及作完整的建设，便已被逼入另一时期——封建传统的死恢复燃和没落底资本主义哲学的时期。这时期的特征是人生问题的研究，但当时的社会变迁比较复杂，须先述其概略如下：——

这时的哲学思潮，部分地颇类似十九世纪后半的欧洲，那时资本主义社会机构的内底矛盾已开始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文明遇到了“禁止通行”的挡路碑，社会的物质底发展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没落的命运，使得欧洲资本主义底哲学家不敢正眼观察物质底社会，努力借唯心论底哲学向心灵中求精神底慰安，解脱，和出路，于是人生问题的研究便代替了宇宙论和方法论的位置。不管叔本华，尼采，或是柏格森，倭根，对于哲学所提出的都是人生问题，心灵问题或道德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世纪末哲学。五四文化运动终了之后直到一九二七，可以说是中国的世纪末。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即在中国不单只是资本主义临到了没落的命运，还接着来到了半殖民地特有的新的转变：发育不全的民族资产阶级向着两种另外的阶级分化开来，或则投向国际帝国主义的羽翼之下而成为买办阶级，或则又将资力投诸土地而成新的地主阶级，而新的地主阶级又常经过买办阶级的媒介而与帝国主义取着一定

的联络关系。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新的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广大的下层民众之三重铁塔！三者在一一定的经济利益上常是联合一致。今日之封建地主已不如二十几年前的封建地主之顽冥不化，决不至于如“子夜”中的吴老太爷似的，一来到上海看见资本主义文明便至于震骇不安而死。宁可反过来说，在乡下愈是利害的土豪劣绅，到上海愈会寻找极摩登的事物开心，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与自己孙女的女友进跳舞场合舞的事早已恬不为怪了。研究人生问题的哲学，在中国，不比在欧美纯是世纪末底资本主义哲学，而是世纪末哲学与封建传统哲学之结合。又况学问的道路太艰苦，每个学者差不多都要走上政客官僚的门路，在官僚政客的环境中，传统思想的研究是受人欢迎的，曾忆太虚法师讲佛学时，听讲者尽是一些蠢头蠢脑的失意政客，明明是不甚了解的，偏要像煞有介事地谛听，当时只觉很好笑，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并不仅是可笑，还有其他的意义。在这样的环境中，学者研究的复古倾向是必然之势。即或者一二高洁者，不向政客堆里攒，能保持在文化中心地当穷教授，也为周围的空气所影响而多少要涉及儒释道的旧典籍。故以尼采及几何学方法为基础的李石岑先生的研究中，也未全能全不涉及旧有哲学，而朱谦之的唯情哲学还是从虚无哲学脱胎而出。世纪末与封建哲学之结合，是人生问题时期之特哲学。如果我们说世纪末的哲学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哲学，而中国的买办阶级可以代表金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一体，则把人生问题的研究看做地主哲学与买办哲学之结合，亦无不可！

因此，以人生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是民族资产阶级堕落以后的退步的哲学，其发生，宣示了资产阶级已不能再成为社会发展的推进者了。中国哲学的新时代，中国的有着无限的“将来”的哲学思潮，是在一九二七年后掩蔽了全思想界的唯物辩证法思潮出现时才显露头角。

前进的文化和前进的哲学必须有前进的阶级来担当，如果中国没有负着创造将来之使命的阶级崛起，前进的哲学也不会可能。谁是中国将来的主人？五四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虽确曾遂行过推进历史的使命，然而五四以后便中途没落了，既分化为帝国主义的附庸附与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怎能还有使中国前进的能力？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否有生死的利害关系者，从此只有广大的最受抑压的民众。他们在封建军阀，买办，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之下在团结，挣扎，斗争，全世界的被压迫者的呼声与他们互相应和，中国的将来和世界的将来是一致的。怒吼的声音震撼了全球，唯物辩证法哲学的锋芒的真理使被迫者的前进之势成为锐不可当。

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新的前进阶级之哲学，虽然是在人生问题的思潮之后才光临了思想界，但决不是从人生问题承袭而来的遗产。故其最初的发生决不从于人生问题的思潮。我们可以回溯到五四文化运动中去寻找它的萌芽。在这里，陈独秀先生的文化上的功绩也是不可否认的。在“科学与人生观之论”中，陈先生已正式提出唯一的唯物史观的战意见了。事实是这样的：前进的资产阶级的使命告终之后，即五四文化运动终了后，哲学上的史的发展便分成两条平行的而又互相争斗着的主流，一是堕落的世纪末哲学，一是唯物史观的思潮。如果用欧洲的情形来对比，则黑格尔可算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前进哲学之顶点和没落点，此后便是两大主流的平行的斗争的发展：一是叔本华，柏格森，尼采，倭根以至狄尔泰等人的人生问题道德问题的潮流，一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至伊里奇的唯物辩证法的潮流，前者是堕落的资产阶级欲在精神中求慰安的企图，后者是前进的阶级在物质中求胜利的怒潮。中国的哲学思潮也就是这样地发展下来的，不过一九二七年以前是人生问题较优胜的时代，一九二七年以后是没落阶级的丑态已暴露无遗，前进阶级的哲学才达到支配力的顶点的时代。于是唯物辩证

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许许多多旧的文学者及研究家都一天一天的“转变”起来。人道主义者的鲁迅先生抛弃了人道主义，李石岑先生撒开了尼采，朱谦之先生听说也一时地成为辩证法唯物论者。任何顽固的旧学者，只要不是甘心没落，都不能不拭目一观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任何能于独创的敏锐的思想家也不得不向资本论求助。如果有人以为这一切的转变仅只有“投机”的意义，那是根本不能理解历史！因为，“投机者”固然不能免，然而也得先要有“机”可投，“投机者”也才会发生。而所以能造成这样的“机”者，实不能不承认是由于中国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民众们的光辉伟大的历史行动之胜利。

也就因为有“投机者”存在的缘故，种种不正确的倾向便由内部发生，于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名义之下，人生问题的唯心主义固然已销声匿迹了，但披着唯物论的外装的另一种唯心论便在辩证法之中发展起来，正确的唯物辩证法不能不另用一番心力与之抗争，与之分裂，这分裂的过程也与欧洲的情形很类似，尤其与苏联的哲学论战之过程相一致。一九二七年的新文化运动将布哈林的机械论，蒲格达诺夫的机械论与经验批判论等与普列哈诺夫德波林伊里奇的哲学毫无分辨地输入了中国。分裂的第一阶段和一九二三至一九三〇年的苏联一样，是对于机械论的批判，布哈林的机械观最初受到了清算，“社会史的论战”中在方法论的问题上也有着机械论与辩证法之争。张如心先生的哲学活动也可以算做代表者，此外还有种种的翻译介绍。但在机械论批判之后，哲学又停滞于普列哈诺夫与德波林的形式主义之门限。苏联的德波林的反对机械论之中心人物，但他自己又终于使辩证法哲学脱离了社会政治而成为空洞的书本学问。在一九三一至三二年遂受到许多新的学者之批判。在中国，德波林的清算是一直一九三三年才开始，而胡秋原先生到此时还拼命地替德波林与普列哈诺夫张目。我们所能看见的唯一有系统的述作只有现象月刊上的卢更夫先生的论文，此外还有一本“教程”的翻译。

接着，旧的没落哲学之死灰复燃的时期又到来了。最近半年以来，哲学的论坛上就有唯生论之出现，张东荪也在大反对其“动的逻辑”。朱谦之先生忽而又回到柏格森的老家，要以黑格尔来解述直觉哲学了。这一种倾向之出现，也与外国的情势一致，一方面是因为德波林哲学也最后受到了清算，虚伪的唯物论已无法披着“投机者”的外装而存在，只好作露骨的现面，一方面是军权独裁政治的发展，对各种言论实行高压，而没落的生命哲学存在论哲学在日本和德国都因此得以抬头于指挥刀的保护中。唯生论与生命哲学是二而一的东西，同样标榜既不唯物，也不唯心，而是唯生。以生命，生活，人生为研究对象。实则仍只是化过装的唯心论，是唯物论的死敌。而在中国的唯生哲学，也和以前的人生问题时期一样，内中仍混有封建的传统哲学之要素。又是一度的封建幽灵之复归！

唯物论内的不正确的倾向，是代表着“投机者”的不正确的阶级意识，是没落阶级在观念形态的领域向前进阶级阵营内偷入的袭击。经过了两次清算，偷入者无门可入，结果便成为正面的刀兵相见。目前就是正面刀兵的时代。

中国二十二年来来的哲学思潮的进展大体如此。以后的结果会怎样呢？在这里不能备述。总之，中国在今日已是世界的政治经济问题之中心，中国的哲学思潮的将来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及世界政治经济的前途都有着密切的必然的关联。

兹将二十二年来哲学发展的年代作表如下，以清眉目：——

年代	四一四年	四一一〇年	一〇一一六年	一六一一九年	一九一二二年	二二年
思潮的主流	在封建基础上的新思潮之输入	五四文化运动—资产阶级的哲学—科学方法	人生问题时代	人生问题研究失势	唯物辩证法哲学的内部分化及不正确倾向之清算	人生问题研究复活—唯生论
			潜滋暗长的唯物辩证法哲学	唯物辩证法的极盛时代		唯物辩证法内部清算的完毕

(《中华月报》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四、一、)

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

艾思奇

文化在中国, 是非常庞杂而又极不平衡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 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正是非常庞杂而又不平衡的缘故。农村和都市的经济上的悬隔, 也使得文化上发生悬隔。内地和沿海各省经济上的差异, 也形成了文化上的差异。在上海这样大的都市中,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最尖端的物质文化的存在, 而在社会的下层以及内地农村里, 甚至还有许多无文化可说的地方。自然我们不能忽视, 中国的经济在本质上是半封建制度, 在文化上也以封建性为支配的基调。旧礼教的变相的教义仍在社会上层广泛地宣扬着, 至于社会下层的大多数人仍没有脱离了旧的俗流文化(像旧戏, 旧小说, 鬼神迷信之类)的影响。虽然这些东西已经是在不断地表现着动摇和崩坏的象征, 并不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坚信, 但复古的倾向却是到处存在着的, 而且还有人在不断地努力想加强这种倾向。

在这半封建的基调里面, 各种各样的文化要素掺杂着, 于是就有了目前中国文化上的庞杂而不平衡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怎样造成的呢? 我们要说, 这是由于过去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务。过去的新文化运动, 是在辛亥以前的康梁时代已开始了, 它的任务, 在这一开始时就是反封建的。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运动, 就是反封建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但这运动结果失败了, 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 也没有把封建制度真正推翻, 只把军阀的封建制代替了君主的封建制, 在文化上虽然从西洋搬进了一些自由, 平等, 博爱的观念, 但并没有明白地确定了新文化的意义, 没有用新文化来动摇过孔教的一导。五四运动是比较彻底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在这里有了自己的科学方法, 它反对迷信与独断, 对于一切都要问为什么! 这样和封建的文化明白地对垒起来。这一个运动自然也留下了许多新的和进步的东西, 文字改革和白话文的提倡, 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的介绍, 对孔教的积极的攻击, 以及后来一天天占势力了的新社会科学思想的出现, 都不能不说是五四运动的功绩。但这一个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坚实, 它没有能够打倒了自己的敌人, 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只留下了一些功绩, 同时仍然让旧文化并存下去。

两次的新文化运动都没有完成, 它只好把自己的战斗的血迹, 和旧文化的残遗一同留传下来, 目前的我们, 就是这些血迹和残遗的承受者, 因此我们所遭遇到的文化现象, 是一个

非常庞杂而不平衡的现象。

但这一个文化现象，在目前是要再来一个新的运动了。

这一个运动是怎样的东西呢？这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这一个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民族敌人的猛烈的新的进攻的刺激，是由于亡国的危机的迫切，是由于民族敌人不但要灭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用种种方法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化上也要成为他们的奴隶。敌人要叫我们修改教科书，要叫我们消灭一切爱国的文化运动，敌人仇视我们的一切有关国防的物质科学的设备。敌人所要毁灭的不单只是新的文化，而且也仇视我们旧文化里的有价值的要素，他们设法阻止民间的爱国连环图画流行，旧戏中有爱国意义的“风波亭”“走麦城”之类，他们也设法使它不能上演。

是的，他们也曾替我们宣扬孔教，也曾派僧侣来帮忙佛化，在中国许多地方强迫着建筑了一些寺庙。是的，他们就好像在替我们保存国粹，替我们宣扬旧文化。然而他们是要我们保存糟粕，把旧文化中的最有害毒的东西发挥出来。我们认为孔教是独断和迷信，而他们却要巩固这样的一个“教”。倘若单就孔子的伦理哲学来说，个别的部分也未尝没有可以采取的地方，譬如说“礼义廉耻”罢，倘是真正的“知耻”应用到目前的情势上来，也未尝没有用处，因为现在最大的耻是国耻。然而敌人绝不愿意我们知道这个大耻，却替我们奖励迷信的孔教。

这样的情形下所产生的新的文化运动，和五四时代及其以前的文化运动自然是不同的。就是它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

五四时代及其以前的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带着爱国主义的意义的。辛亥以前的改革是由于屡次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和国耻有密切的关系。但那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国民的侵略压迫，是通过了封建的统治势力，因此，就像政治上的运动是以反封建统治为直接目标一样，文化运动的直接目标也是旧制度和封建文化。在政治上，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是同样重要的，而在文化上，却特别着重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运动上的爱国主义，是从改造自己出发的。但现在的运动，是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处境之下发动，自己改造的余裕已经没有了。敌人要并吞的是整个中国，即使是封建残遗，倘若是想走活路的话，也只有走上爱国主义的一途。所以，现在是要集中一切有爱国意义的文化成果，不管是旧的也好，新的也好，一致地去要发挥对付外敌的作用，而不单是在自己内部做反封建的工作了。

这并不是放弃反封建，封建残遗在目前，仍是最容易被敌人利用的东西，对于封建残遗的毒素，我们仍同样要抱着最大的警戒。但我们不需要五四以前那样单纯的反封建。就是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他能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我们还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但我们也要毫无顾惜地排斥有毒的渣滓。我们不需要五四时代那样对旧戏持完全排击的态度，我们还需要现在被禁上演的那一些东西。我们要排斥和忠君同类的盲目服征的思想，但如果有人讲民族气节，我们仍可以接受它。

爱国主义的文化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并且是要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要素也好，封建的文化要素也好，不论是实验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只要你所发挥的是有用美点，都竭诚欢迎你到这运动中来，或者换一个说法，目前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个爱国的自由竞争场。不论它的爱国兴趣浓厚也好，淡薄也好，甚至于没有一点爱国的表现也好，只要不是帮助敌人，这里都有它的一席座位。但

这运动希望它尽可能地要在爱国方面有点作用，如果它的爱国的作用愈更发挥得多，那它就愈更出色；最能够发挥这种积极性的文化，在这运动中就会站主导地位。

这是我对于目前中国文化运动的一点原则上的见解，这是急需要积极地做起来，而且需要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人大家合作的。关于这问题，陈伯达先生在《新世纪》第一期上有一篇《论新启蒙运动》，在《读书生活》四卷九期上又有一篇哲学的国防动员，发表了很精彩的意见，希望国内的文化人以及其他读者诸君参看一下。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十九期，一九三六、十)

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

艾思奇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中国的旧话，曾经被许多人误认做历史唯物论的说明，其实这样的说明，和真正的历史唯物论是离得很远的。“知荣辱”（或者扩大一点说：“文化”）虽然和衣食有不可分的联系，而且历史唯物论也必须要承认这联系，这联系多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和形态，并不是刻板的公式，并不是一定在衣食足的时候就有文化，衣食不足就始终只是野蛮的。事实上常常相反，就目前的世界来说，最不知耻的黑暗的人群，最大的文化的毁灭者，正是要从那衣食太丰足的人们中间去找，而衣食感到恐慌的人群，却往往是前进的生活和文化诞生的基础。自然，这里是有个例外的，那就是苏联只有在苏联那生活和文化的提高才常常和衣食丰足的程度形成正比例的发展，因为他们的衣食的丰足，是自己创造得来，而不是从另外的人群或国家掠夺来的。

衣食（或者一般地说：经济生活）和文化确实有密切的联系，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人类文化的基础，而人类的文化又只是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但这种联系，并没有证明有钱人一定文明和穷人一定野蛮，这联系只是表现为这样的事实：那怕是在社会上处于被屈辱的地位的人，那怕在这地位上不断地感到经济生活的恐慌和穷乏，如果这恐慌和穷乏是逼着他们向上，逼着他们对屈辱和被掠夺的现状起来反抗时，他们的反抗的努力就是“知荣辱”的表现，他们在反抗的努力中就同时会促进（至少会要求）了文化的向上。反之，对别的国家或人民实行侵略掠夺，或者帮着侵略者掠夺别人，以达到自己的丰衣足食的人，才是真正“不知耻”的人群，是文化的破坏者。

中国的近代史，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上发展过来的。在这被侵略的过程中，中国的民众是一天比一天更广泛地陷入屈辱和穷乏的深渊里，同时也就是被迫到不能不起来反抗的境地。而另外的少数人，特别是为要维持丰衣足食的优越生活的人，却不能不一天天地投降到帝国主义的旗下。在这两种极端化的过程中，是存在着许多游动的中间层的，他们可以成为反抗的战士，也可以成为奴隶，然而他们终于是要分化，而在二者中间选择一条道路。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内在的矛盾，这使得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一切纠纷都带着民族革命的意义，带着做奴隶者和反抗斗争实行者中间的争斗的内容。做奴隶者在文化上所走的道路是开倒车的路，是毁灭文化的路。只有反抗的战士的道路才是前进的路，才是促进文化的路。

这样的两条路，是在中国近代史一开始的时候就摆列在我们民众的前途上了，但如果不是发展到了目前的阶段，也许这不至于带着这样特别的明显性和触目性而暴露出来的吧。目前阶段的中国历史，是走近了新的形势中，而中国的广大民众，也获得了一种新的觉悟。敌人使中国殖民地化的行动，是在目前的阶段上进展起来，从各国的势力范围圈进入到一国的独占，从间接的政治经济支配到直接的干涉的掠夺（如走私等）。这一切，使得游移的中间层也不能再游移了。做一个保卫国家的战士呢？还是做一个出卖民族的汉奸呢？目前的情势逼着人不能不快快选择一条，然而敌人的直接干涉和掠夺，使得做汉奸的人的活动范围也缩小了。只有反抗才是出路，虽然这也免不了牺牲。要做无耻的汉奸而保持生活的优越，却并不是绝对稳妥的事，所以，目前的形势要我们选择的已不是做奴隶而荣耀，或做战士而难免牺牲的两条路了，目前的中国民族只有一条生路：这就是为国防而战。

为国防而战，是目前中国最广泛的民众所急需的行动。这需要是最广泛的（各阶级各党派），因为敌人的新的侵略动摇了最广泛的人民生活的基础，使他们在经济上都感到了恐慌，使他们因此不能不走向“知耻”的道路，这使各阶层各党派的一切知耻的人们不能不团结起来，发动一个联合的抗敌运动，这就是所谓联合战线的客观基础。在文化上，这联合战线就反映成进步的方面，联合战线推动和促进了目前中国文化的运动。

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新形势之下，拚命走着死路和出卖民族的汉奸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只是他们所赖以立足的基础都极脆弱，甚至于说不上群众的基础。就是投降敌人，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揭着虚伪的抗敌幌子；而在群众不受欺骗的时候，就只好更无耻地实行疯狂的压抑。愈是脆弱无力的存在，就愈是猛烈地想维持它自身的生命。在文化上的表现也是一样的。在目前，奴隶的开倒车的文化破坏者和联合战线的文化运动形成了尖锐的对垒，而且是特别明显和暴戾。

联合战线上的文化运动表现着一些什么特征呢？这表现在全文化领域的实践的总动员上，文化运动的联合战线运动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联合战线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这文化运动又要用它的全力去帮助和推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联合战线，文化领域的实践的总动员，就是为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目前动员的状况，是集中在两个中心问题上：第一是对于文化的大众化的彻底的关心。文化落后的中国，大众化的运动是切迫地需要着的。尤其因为联合战线运动的最重要的基础是下层联合战线，要巩固下层联合战线，就必须使广大的下层民众更正确地理解联合战线的意义。目前的通俗化运动和新文字运动在这一点上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两种大众化运动的作用并不仅仅限于帮助联合战线运动，然而在目前，它却必须以这为主要的任务。因为它的更高的作用也是得要在联合战线的斗争中去争取，去发挥的。

第二，是文化各部门的国际化的动员。目前文化界已经在热烈地讨论着“国防文学”，“国防科学”，“国难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这是说，文化界各部门的人们，现在都在努力着抗敌救亡的组织，他们是要把一点一滴的有用力量都毫不遗漏地使用到救国运动上，他们要宝贵一点一点的力量，所以不论是在文化上所占的部分，派别，凡是愿意站到联合战线上来的文化人，都得把他们的特殊技能贡献给目前的任务。文化的国防化运动，显然和大众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没有大众化运动，国防化运动就不能深入民众，没有国防化运动，大众化运动也只是空洞无内容的东西，大众化的形式，国防化的内容，是目前文化界的实践总动员的完整的姿态。

然而，目前中国文化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文化运动是取着爱国主义的现象形态的，